

清者大节

●张磊

“清”是古往今来对官员的一贯期许，被赋予了丰富的价值。在不同历史时期，尽管治乱不一，但社会始终保持对官员清廉的要求或期望。

官箴书在某种意义上为考察古代官员对于“清”的思想认识提供了便利。该类典籍反映了古代官员群体对自我的认知、要求和规划，其中自然也包括对“清”的认识和思考，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员的清廉自期与自戒。

清代的官箴书数量最多，内容丰富，包罗万象，但阐述的为官道德无外乎“清、慎、勤”三者。尽管“清、慎、勤”都是官员应当遵守的准则，但三者的地位并不完全相等。中国传统社会中，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民众，都对“清官”推崇备至。包拯、海瑞、于成龙等被冠以“青天”之名，在明清戏曲、小说中，包拯甚至被演绎为可以“日断阳、夜断阴”近乎神的角色，铁面无私的包大人也因此被民间称颂。可以说，包公形象的广泛流传，与其清官形象密不可分。在推崇清官的背景下，对官员“清”的强调自然是理所当然、天经地义了。

“清者大节”是古人对“清”这一道德操守的高度概括。明代吴遵在《初仕录》中说：“清、慎、勤固居官领要，而清为本。”清代金肱斋更是提升“清”的地位，提出“清者大节”的期许，曰：“清者大节，慎则无误，勤则能理，昔人所谓居官三字符也。”

所谓“清者大节”，强调“清”在三者中的基础或统摄地位，可以从清心寡欲、清廉俭朴、清正廉明三个方面来理解，分别对应官员的精神追求、生活准则和施政规范。

清心寡欲：官员的精神追求

“清”首先是官员应有的一种精神境界。官员在精神层面上应追求清心寡欲，以此避免贪污。著有《牧令须知》的刚毅将“清”与摒弃物欲相联系，认为“所谓清者，了然于义理之辨，绝去乎物欲之私”。

清心寡欲对于官员道德品质的塑造具有积极作用，王景贤认为：“清虽一节之长，然为上者一有贪利之心，则已无所不至矣，故寡欲为尚”。

寡欲还常常与读书相提并论，王植在《二要》中就认为，“当官有二要，一曰读书，不但开卷有益，增人智识，亦且一对书史与圣贤晤接，心境清明得自悟其

过，自坚其守，是内省之资也。一曰寡欲，嗜欲既寡，精神自生，是检身之要，儒修之实也。”

清心寡欲只是精神层面提出的自我规范，更重要的是，要在物质层面克制内心食欲，避免嗜好在现实中被人利用，从而使自己成为商贾或胥吏“围猎”的对象。清代袁守定指出“有所好即受病”，告诫官员“在官不可偶有所好，但示人以所好，病即缘所好而入，盆花幅草皆足为累”，应遵照明代施邦曜的方式处事。施邦曜任福建左布政使时，有人向他赠送一幅朱墨竹图，家人希望施邦曜接受此画，他说：“不可！我受之，彼即得乘间以尝我，我则示之以可欲之门矣。”袁守定由此感叹：“当路而开可欲之门，则投之者众，为累不诚大哉。”

明代吴遵认为官员“如好技艺，则星算医卜者投之；如好奇玩，则古书奇画者人之；如好花卉，则或以奇花异草中之。嗜好一偏，或投机阱。虽诗文之交，亦有移情败事者，不可不谨”。这一观点被余自强《治谱》、郑端《政学录》等典籍吸收借鉴，成为经典语句。

清廉俭朴：官员的生活规范

官员要做到“清者大节”，不仅应具备观念认知，思想境界上的清心寡欲，更要在生活中身体力行，做到清廉俭朴。清人尹会一提出“居官首重维清”的要求，将清廉观作为官第一要务。郑端在《政学录》中引用南宋名臣、理学家真德秀的名言：“万分廉洁止是小善，一点贪污便为大恶。不廉之吏，如蒙不洁，虽有他美，莫能自赎，故以此四字之首。”这里提到的真德秀所说“四字”即廉、仁、公、勤，而廉居首位。

“律已以廉”则必然要求官员崇尚俭朴、拒绝奢靡的生活方式。郑端认为官员应“尚节俭”，强调“我辈矢志安民，既不科派里甲，又不苛罚重秤，则衙中费用便难望之地方。初赴任者，第一要节俭，莫谓官为钱树便可取给”。戴肇辰在《求治管见》中认为：“节用自本官始，凡衣服、饮食、起居虽小事，亦不可稍有浮费，庶亲友、子侄辈均有所法效，而胥归俭朴矣。”

士大夫阶层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，其个人或家庭的行为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。《治镜录集解》说：“民俗俭朴，则风俗醇厚而国有蓄积，若躬行节俭，而其下化之，则效尤普矣。”如果官员躬行节俭，百姓就会效仿，有利于全社会

形成节俭的风气。

此外，提倡官员节俭，有利于促成俭以养廉。这一点，赵申乔在《禁绝火耗私派以苏民困示》中说得最直白：“诸凡室宇之美、妻妾之奉与身衣口食、日用常行之需，俱当刻意简省，所谓俭可养廉是也。”

江西南丰人刘衡曾任四川垫江知县，颇有善政。有一回，他抓获一个盗匪，得知是初犯后，询问他为何误入歧途，得到“饥寒迫尔”的回答后，他下令放了此人，并赠了些钱给他谋生，相约如果再有犯罪行为，绝不宽宥。

刘衡亦是一位俭约的官员，他在《自治官书》中说：“本宦自登仕版，正己为先，到垫任，即革陋规、绝馈送，以俭为养廉第一关键。衣惟布茧，食惟菜蔬，署中每日米盐零杂，上限只用钱六百文，或因公出，骑从甚简，性尤刚毅，绅衿戚友不敢私干，设卧榻于二堂侧室，屏去一切嗜好，惟昼夜理公事而已，其立身清正如此。”清廉俭朴的生活方式，说来容易但做起来难，但总有循吏能够耐苦坚持。

清正廉明：官员的施政准则

“清者大节”不应仅是官员精神之追求、生活之规范，也应是职业之伦理、理政之准则。因此，“清者大节”最终要落实在官员的日常公务活动中。

在清代地方政治格局中，州县政府的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，州县官的职责十分繁重。他们除了守土、维持治安和征税等工作以外，还担负处理诉讼的司法职能。州县作为第一审级，亦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审级。特别是，随着清代人口数量增长、诉讼案件增加，处理诉讼已经成为州县官的主要工作。州县官大笔一挥，便判定了一人一家之生死荣辱。

褚瑛为此提出“勉励清操”的要求，“为官清、慎、勤三字，惟清字为最要。凡判断一切词讼事，不可稍存私心、贪图贿赂，一经得贿，则是非颠倒，屈者则倾家荡产，以图逞其忿恨；直者受屈莫伸，势必抱怨走险上控。设若得直，则原办之不公显然败露，上宪必致中伤。倘仍照县案而不直之，则受屈愈甚，轻则翻控不休，拖累无穷，重则自寻短见，轻生毙命，于心能无愧乎？且本官一人得贿，则绅士从而挟制，亲友子侄辈因而招摇，家人、书差莫不借端索诈，致尔声名狼藉，为害可胜言哉。”可见，他清醒地认识到“清正廉明”对于官员施政的重要性，收



清代郑板桥《墨笔竹石图轴》。明代施邦曜曾拒他人相赠的朱墨竹图，清人将此事载入典籍，以说明为官者勿因嗜好而为人利用。

图片来源：故宫博物院网站

受、索取贿赂将影响案件的裁判和诉讼双方的利益，甚至给地方治理带来负面影响，同时还会影响本人官声，“致尔声名狼藉”一句可谓触目惊心。

方大湜在《平平言》中，提及官员不可贪的六大理由，乃坏心术、败风俗、损声名、干国法、辱祖宗、毒子孙，他的论述常是从案件裁判的角度切入。如“败风俗”一条中，他抨击有的官员“一切词讼，惟知索贿，犹其小者，甚至人命重案，亦不问正凶，但访其族之衣食稍足者，巧为罗织株连，不使破家荡产不止”，如此败坏人心、扰乱风俗，断不可取。由于危害如此巨大，文献中反复告诫官员在审理案件、羁押犯人时，要谨记“审案断不可取分文也”，“不受买嘱、妄加锁锢”等，这方面的提醒十分频繁。

“清者大节”思想，体现了古代官员群体的一些中坚对自身的思考、定位、期许和警戒。这一思想对帮助官员提高道德修养、规约司法审判、传播循吏与清官的形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，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尤其是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入得其境，方知其美。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有机结合，使得旅游演艺既是旅游产品，更是文化作品

只有把“此景”“此事”“此人”融合起来，把“山脉”“水脉”“心脉”贯通起来，才能唤起历史的记忆、形塑文化的认同，真正为当地连人脉、畅经脉、续文脉

以旅游演艺增强文化磁场

●张铁

因一台剧，赴一座城。杭州宋城，《宋城千古情》绘就历史与文化、情感与艺术的画卷；武夷山麓，《印象大红袍》演出“饮罢方舟去，茶烟袅细香”的意蕴；骊山脚下，《长恨歌》展现千门万户、千歌万舞的大唐风华……中国式的山水意境、地方化的文化抒怀，旅游演艺正日渐成为各地的“新名片”，让大批游客沉醉其中。

旅游演艺，是地方历史的一种凝练书写，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诗意表达。游客与旅游演艺，无疑形成了一种“双向奔赴”。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旅游演艺场次超15万场，观演人数超过8000万人次，票房收入超过166亿元。从供给侧看，优质旅游演艺项目深度激活了当地文旅资源，让“日游夜演”成为常态；从需求侧看，契合了游客充分感受当地历史文化、民风民俗愿望的演艺产品，让旅游体验更丰富、更立体。也正因此，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《国内旅游提升计划（2023—2025年）》明确提出，拓展旅游演艺发展空间，发展特色旅游演艺项目，推动旅游演艺提质升级。

入得其境，方知其美。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有机结合，使得旅游演艺既是旅游产品，更是文化作品。在山水之间，呈现人们的劳作、休憩；在舞台之上，演出历史中的烽火狼烟、生死抉择……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“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”中，无论是《魅力湘西》《印象·刘三姐》，还是《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》《又见平遥》，无不是依托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，精心打造而成。耕耘收获皆可成景、柴米油盐都是故事，游客刚刚踏访过的场景、追忆过的历史扑面而来，在身临其境、心连其情之中，产生更深刻、更厚重的文化感知。

这样的文化感知，绝非靠着符号的堆砌、歌舞的铺排就能完成。“空口说立不起来”，如果没有文化的赋能、精神的支撑，再好的资源也难免是明珠投暗。游客在游览过山水名胜后，自然而然会想了解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，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。不管是依托于山水实景，还是呈现在剧场舞台，或是主打互动感的沉浸式演出，只有把“此景”“此事”“此人”融合起来，把“山脉”“水脉”“心脉”贯通起来，才能唤起历史的记忆、形塑文化的认同，真正为当地连人脉、畅经脉、续文脉。

一地有一地的历史，一城有一城的文化。重形式而轻内容，重技术而轻艺术，旅游演艺就变成了单薄的山水秀、技术秀，难以真正打动人心；盲目复制粘贴其他地方的成功案例，也可能“水土不服”；甚至，如果哗众取宠迎合市场、故弄玄虚过度包装，还可能让文化资源失去本真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一些旅游演艺之弊，或许也折射出理解传统、赓续传统、活化传统时的误区与盲区。能否摆脱对“声光电”的纯粹依赖？能否超越“歌舞戏”的简单重复？能否跳出“同质化”的窠臼？能否有更多“小而美”的精品？这些进一步发力的方向，也是旅游演艺走出低水平重复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。

好的旅游演艺，应该经历文化“解码”与文化“编码”的创作过程——提炼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，组合升华成全新的表现形式。这样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磁场，让游客“由感而知”，更好地体认自身、他人和世界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唯有更好地擦亮旅游演艺这一地方文化之眼，才能更好实现旅游的价值，让旅游成就更丰富、更充实的美好生活。

说唱艺术与四大名著

●耿柳

我国的说唱艺术历史悠久，内容题材广泛。许多说唱文本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，为后世文人创作章回小说提供了重要素材。或许可以这样认为，说唱艺术是某些章回小说的雏形，反过来，小说形成后，说唱艺人又根据小说进行二度创作，丰富了说唱曲目，使说唱艺术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。说唱与小说两者相辅相成，从而使中华文学艺术宝库凸显出独特的魅力。

单就四大名著而论，它们与说唱艺术

有着极深的渊源。北宋钦宗靖康二年（1127）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记录了“霍四究说三分”的场面。“说三分”即讲述东汉末三分天下的故事。勾栏瓦肆中的职业说唱艺人，把滥觞于民间野史的梁山好汉故事、三国鼎立故事、唐僧取经故事敷衍成篇，有文人记录整理的宋元话本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《三国志平话》和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传世。话本中的“智劫生辰纲”“杨志卖刀”“宋江杀惜”“桃园结义”“三战吕布”“三顾孔明”“关公斩颜良”“大闹天宫”“打白骨虎精”等情节，后来都被小说吸收。苏东坡在他的《东坡志林》中讲过一个鲜活的故事：有个小孩顽皮，常在家中吵闹，家长就给钱让他去听书。听《三国》时，刘备败了，他就愤慨欲哭；曹操败了，他则雀跃欢呼。由此可见，在宋代说书人那里，曹操就主要以负面形象示人了。

明代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陆续刊行，从其章回体“且听下回分解”的“留扣儿”技巧上，还可以看到说唱艺术的痕迹。说书先生对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风格的建立，可谓功不可没。小说刊行后，说唱艺人兼收并蓄，借鉴生花，创演繁盛，曲目又以三国题材为最。相传，这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喜欢《三国演义》有关。他们曾让人把《三国演义》译成满文，以方便阅读。皇太极还喜爱听书，据顺治年刑部《题本》载：“庄头（相当于旧时村长）石汉供称……我于太宗皇帝陛下说书六年……”石汉既是庄头，估计难有高深学问，他给皇太极说的也不太可能是正史，估计是《三国演义》一类的野史。清历代皇帝都尊崇关羽。顺治敕封其为“忠义神武关圣大帝”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一路加封，至光绪时，封

号已达26个字：“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”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全国普修关帝庙，广演关公戏，说唱艺人不甘人后，产生了京韵大鼓《草船借箭》、扬州清曲《华容道》、渔鼓道情《要荆州》、相声《奎批三国》、西河大鼓《连环计》、二人转《关公盘道》等名篇。东北大鼓尤甚，把上演的目分为三大类：子弟段、三国段、单段，三国段50有余，单是霍树棠一人就唱过《斩华雄》《虎牢关》《华容道》《单刀会》《战潼关》《空城计》等20多段，几乎涵盖了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主要桥段。

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在小说的基础上继续丰富铺陈，60多万字的小，到了袁阔成这代，达365回、200万字。

很多说书家是以前述名著故事而闻名遐迩的，如“活张飞”唐耿良、“活关公”康重华、“活鲁达”卢醒笙、“活武松”张青山、“活猴子”张坪益、“活孙悟空”奎道顺等。安太和专说《西游记》，他把孙悟空学得惟妙惟肖，人称“猴儿安”。他的特色是“大书一条筋”，把原著中与孙悟空关系不大的情节尽量省去，集中描绘“猴子”的形象。

这种剪裁方式也是说唱艺术的常见手法，如山东快书《武松传》就有体现。“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。”山东快书原称“唱武老二的”，即以唱武松的故事为主，傅汉章、刘同武、高元钧等擅演。《武松传》全本近20万字，唱词多达8000余句，单独把武松的故事抽离出来，还增添了许多小说中未见的情节。如武松离家学艺，原著中只说了“误伤人命”4个字，而《武松传》生动表述了武松年少时如何痛打恶霸刘银贵，而后到少林寺学

艺，“功夫练到八年上”。此后武松回家探亲，又路见不平，打死李家五虎，充军发配途中假扮新媳妇，再次为民除害。这些情节增强了悬念，满足了观众心理需求，还构成了《武松赶会》《武松装媳妇》两段曲艺舞台独有的曲目。

在四大名著中，唯有《红楼梦》因为是文人独力写成，成书之前未受到说唱艺术的影响。但其成书之后不久，清代子弟书《黛玉悲秋》《露泪缘》《黛玉葬花》《遣晴雯》等就应运而生。听书看戏，一直是百姓获得知识的捷径。许多人是通过传唱的子弟书段子才知道宝黛故事的。所以有人说，子弟书是《红楼梦》艺术生命的延伸。子弟书的作者多为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八旗子弟，他们擅长赋比兴，且看《露泪缘》中黛玉归天的一段唱词：

香魂抱魄飘然去，这时候正是宝玉娶宝钗。一边拜堂一边断气，一处热闹一处悲哀。这壁厢愁云怨雨遮阴界，那壁厢朝云暮雨锁阳台。这壁厢阴房鬼火三更冷，那壁厢洞房佳气一天开。宝钗拜堂和黛玉魂断的画面不断闪回，对比强烈，真是“满座重闻皆掩泣”。

正因为《红楼梦》子弟书是体现原作精神的创新性诗篇，北方曲艺舞台的京韵大鼓、东北大鼓、西河大鼓、梅花大鼓、梨花大鼓、河南坠子以及二人转中，传唱的《黛玉悲秋》和《宝玉探病》基本都是子弟书原词。南方某些曲艺、戏曲也深受其影响，如贵州的《红楼梦弹词》十三出和《露泪缘》的十三回相同，越剧《红楼梦》中“宝玉哭灵”的感人唱词，也是移植自《露泪



霍树棠在录制北大鼓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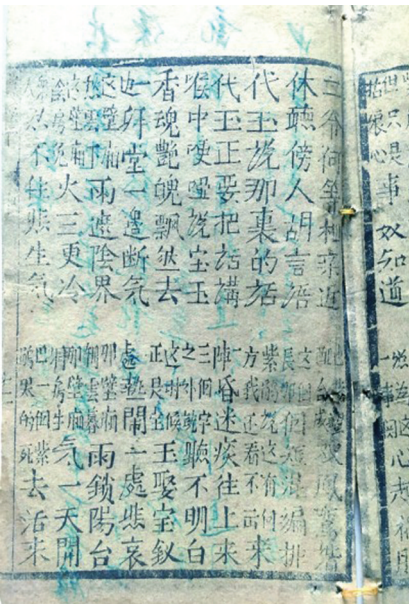
袁阔成演出照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缘》第十回“哭玉”。

子弟书以外的《红楼梦》题材曲目还有很多，如相声《红楼百科》、河南坠子《黛玉进府》、弹词开篇《金陵十二钗》、二人转《刘姥姥还乡》等，虽然也在舞台上广受欢迎，但是远没有子弟书影响深远。

总之，四大名著与说唱艺术交相辉映，共同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曲艺演员以其独特的演绎技巧，让经典故事跨越时空，历久弥新。



子弟书《露泪缘》第九回“诀婢”书影。图片由作者提供